企業家日報
ENTREPRENEURS' DAILY

三農專刊

05-08

主编:郭俊英　副主编:廖明　王红英　唐万洪　法律顾问:阙磊　本刊广告代理:四川黑线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编辑:刘静芬　美编:黄健　第001期(总第001期)　2019年9月20日

顾问:郭裕怀、段应碧、吴锆、翁永曦、宋洪远、郭作玉、唐传勤、贾长明、黎兴发、胡银海(排名不分先后)
指导委员会主任:赵文欣
指导委员会委员:杨秀彬、杨新元、彭述明、张国斌、余国成、吴勉、陈杰、杜帆、贾晋、唐述成、吴会轩、张一平、龚显军、张林、游成锟、钟涛、张开义、庞启来、刘献荣、杨智涵(排名不分先后)
支持单位:中国农民企业家联谊会
协办单位:山东好当家海洋股份发展有限公司、河南郑州手拉手集团有限公司、安徽太和殿酒业有限公司、成都阳光铝制品有限公司

中国农民企业家联谊会邀请“三农”专家赴达州为老区产业发展出谋划策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产业振兴是关键。近日,中国农民企业家联谊会发挥桥梁作用,邀请“三农”领域专家,赴四川省达州市为产业发展把脉会诊、出谋划策,助力当地产业振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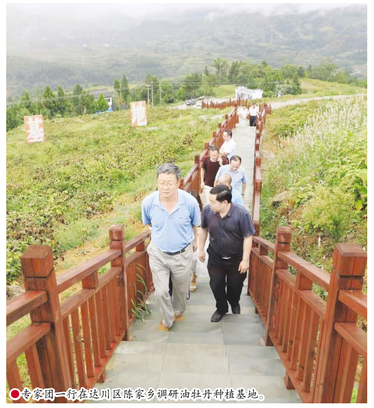
此次邀请的专家有:国家农业部经管司原司长、清华大学乡村研究院副院长张红宇,四川省旅游局原副局长、四川省乡村旅游协会会长吴勉,四川省水利厅原副厅长、四川生态文明指导委员会副主任余国成等。

达州地处四川东部,是革命老区。近年来,当地政府围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积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取得了明显成效,但工作中也遇到了不少困难和问题,给当地政府和投资者带来困扰。此次专家们的到来,无疑为他们送上了一场“及时雨”。

当天,专家们在中国农民企业家联谊会副秘书长郭俊英、达州市农业农村局领导的陪同下,冒雨驱车近两个小时,前往达川区陈家乡油用牡丹种植基地调研。

油用牡丹是一种新兴的木本油料作物,具有产籽量大、含油量高、有效成分高等特点,达州山区的土壤和气候很适应油用牡丹生长。2015年,达州市宏智新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杨智涵为了支援家乡建设,投资数千万元,在陈家乡种植7000亩油用牡丹,以“公司+农户”的经营模式,带动当地农民增收。然而,由于投入多,见效慢,公司在该项目上一时陷入困境。

专家们冒着小雨、踏着泥泞,实地察看油用牡丹的种植情况,详细了解公司的管理状况,帮助公司分析当前面临的困难和矛盾。张红宇是有名的“三农”专家,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他提出了打破单一经营模式,实行种植、养殖、旅游相结合的“三位一体”发展思路。公司董事长杨智涵听了后深受启发,决心调整产业布局、对产业园进行重新打造,力争形成品牌效益。


●专家团一行在达川区陈家乡调研油牡丹种植基地。

●调研通川区蒲家镇蓝莓种植园。

专家们还不辞辛劳,前往通川区蒲家镇的秦巴蓝莓种植园调研。这个种植园是当地产业振兴的亮点项目之一,由四川中蓝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运营。通过参观、访问、座谈,专家们对公司运用现代农业技术发展特色产业的做法予以充分肯定,同时建议该公司丰富产品文化内涵,提高产品知名度、美誉度。乡村旅游领域的专家吴勉还建议公司利用园区独特优势,发展观光旅游业,从而形成农业种植、农业科普、农产品加工、休闲观光等多业态融合发展的产业格局。公司领导欣然采纳专家们建议,表示要科学规划公司未来发展方向,力争做大做强产业,使发展成果更多惠及当地老百姓。　(王红英)

浅谈农村产权交易在乡村振兴中发挥的作用

■ 成都农村产权交易所　秦仕魁　唐鹏程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历史任务,是新时代做好“三农”工作的总抓手。成都农村产权交易所(以下简称“成都农交所”)自2008年成立以来,始终坚持“服务三农,造福百姓”的宗旨,以农村产权交易促进农村资源要素的市场化配置,推动解决乡村振兴“钱从哪里来、人往哪里去、地当如何用”的难题,撬动大量资本向农业农村集聚,充分释放了农村产权价值,有效促进了现代农业发展、美丽新村建设和农民就地就业,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和活力。十年磨砺,成都市围绕农村产权交易平台建设,探索形成了一套服务乡村振兴行之有效的经验做法,为乡村振兴做出了积极贡献。

成都的实践

(一)强化政策支撑,筑牢市场基础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农村产权流转交易纳入全面深化改革顶层设计,明确要求“建立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推动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公开、公正、规范运行”。国务院专门制定出台相关文件,明确了引导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健康发展的意见和方向。四川省委、省政府和成都市委、市政府对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工作十分重视,先后出台了全省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体系建设指导意见、鼓励和引导农村产权入场流转交易办法、成都农交所分支机构建设方案等一系列政策文件,支持成都农交所建设规范统一的农村产权交易市场,促进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在省市政策支持下,成都农交所努力在制度创新、模式构建、品种设计等方面积极探索,全力为4大类21项农村产权流转交易提供服务,有效激活了农村要素市场。经过多年不懈努力,成都农交所累计成交各类农村产权1.6万余宗,金额近1000亿元,约占全国11家同类交易场所交易总规模的一半。已发展成为全国交易规模最大、交易品种最多、服务体系最完善的专业性农村产权交易平台、综合性乡村振兴发展平台、特色性农村金融服务平台。

(二)盘活农村产权,助推乡村振兴

面对乡村振兴这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成都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农村产权的支撑作用,始终坚持将制度设计作为重点和前提,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牢牢抓住流转交易这个核心环节,以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为切入点,探索开展农村土地经营权、林权、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股权、农业类知识产权等农村产权的交易,深入开展农村土地综合整治腾退出的集体建设用地指标、占补平衡指标的交易,积极开展涉农资产处置服务。通过集中发布信息、组织流转、价值发现,实现流转对象多元化,产权价值最大化,增加了农民财产性收入,保障了农民的切身利益;通过农村土地经营权规模流转,实现了适度规模化经营,引入各类新型经营主体投资农业产业化项目,促进了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为乡村产业发展注入了新活力。目前全市30面以上规模流转占比为60%,催生了市级以上产业化龙头企业500余家,农民合作社10000余家,家庭农场近5000家;通过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为一、三产业融合发展提供用地保障,为乡村建设营造“引得来、留得住、做得久”的发展环境,吸引社会资金发展“农家乐”“川西民宿”等特色乡村产业,产生集聚和辐射效应,带动了20多万农民群众就地就业;通过“持证准用”建设用地指标交易和农村土地综合整治项目招商,累计撬动600多亿社会资金投入到农村,按照“小规模、组团式、微田园、生态化”的规划建设理念和“1+N”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配套标准,建成1500多个农村新型社区,改善了45万户150余万农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实现了农民就地就近城镇化。

多年的改革释放出了巨大的制度红利,2018年全市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22135元,是2008年的3.4倍。城乡收入鸿沟逐步缩小,从2008年的2.61:1变为2018年的1.9:1。农村产权交易助推乡村振兴的成效初显,初步形成了城乡群众共创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城乡融合发展的新格局。

(三)交易对接金融,金融服务“三农”

2015年以来,成都农交所紧紧抓住成都农村金融服务综合改革试点的重大契机,大力探索“以交易促进融资,以融资促进交易”,努力开创交易与融资良性互动的新局面。一是积极对接银行机构。与民生银行、成都农商银行、成都银行等银行机构开展全面深入合作,努力将成都农交所的平台优势与银行机构的金融优势有机结合,更好地为农户和涉农企业提供融资服务。创新金融产品“指标贷”,累计为10个美丽新村建设项目实现融资2.25亿元,有效缓解了项目投资方的资金压力。通过银行机构的深度参与,全市累计实现农村产权抵押融资近5000笔,金额超过200亿元。二是积极对接保险机构。探索“鉴证+保险”模式,得到锦泰保险、中华联合保险等保险机构的支持,将成都农交所出具的交易鉴证书作为购买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履约保证保险的核心要件,节省了保险供需双方的信息筛选和对接成本。累计促成70余宗农村土地经营权项目参保,参保金额2312万元,有效分散和化解了项目参与农户、投资人、业主方的投资风险,经营风险和履约风险。三是探索创新金融服务方式。与成都新农村建设协会等机构联合开展农村土地综合整治项目路演和项目推介等活动,为偏远地区土地综合整治项目募集实施资金;积极培育金融服务联络员,对全市16个涉农区县、258个乡镇、3000余名农村金融服务联络员进行全面系统培训,推动农村金融服务提质增量,再上新台阶。近年来,通过引导推动更多农村产权入场交易,不断丰富供需主体,充分发挥交易平台在金融服务中的价格发现、市场集聚和资产处置优势,形成了政策支撑、重点突出、风险可控的“交融结合”新机制,初步解决了涉农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

(四)拓宽市场范围,共享发展成果

农村产权交易市场范围越大,价格发现就越充分。为此,成都农交所坚持以“线上统一、线下联合”的思路,不断扩大农村产权交易市场范围。目前,在成都市内16个涉农区(市)县设立了分支机构,在镇村两级设立了农村产权交易服务站(中心),构建了市、县、镇、村“一竿子插到底”全市全域覆盖的农村产权交易服务体系,初步形成了政府鼓励引导、市县分级交易、镇村宣传初核、所与省内兄弟市州共建共营,努力把农村产权交易的网撒向全省,共同形成全省统一、规范、有序的农村产权交易市场。目前,与德阳市合资共建的德阳分所,一年来已累计实现各类农村产权交易15亿元,是省内其余19个市州(除成都以外)同期交易总额的4倍,有效助推了德阳乡村振兴。同时,成都农交所还与省内17个市州、120个区县实现了联网运行,目前正抓紧与眉山、资阳、攀枝花、宜宾、巴中等市合资共建分所。在努力服务全省的基础上,成都农交所积极探索跨省合作,已与天津农交所、重庆林交所实现“项目互挂”,帮助贵州安顺市、内蒙古科右前旗和敖汉旗等省外地区发布农村产权挂牌信息,助推更多地区乡村振兴。

农村产权交易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就是要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统筹推进乡村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和组织振兴。这一过程中,农村产权交易至关重要。

(一)促进乡村特色产业加快发展

乡村振兴,最重要的是产业振兴。农村土地经营权、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等农村产权通过农村产权交易平台公开流转交易,农村产权的利用效率得到了极大提升,推动农业深度转型,产业落地和升级发展。一是促进农业集约化和规模化经营,催生各类种植大户、家庭农场、农业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如崇州市通过土地经营权流转,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为载体打造了十万亩高标准农田,成为了成都市一大农业振兴亮点。二是推动各类以特色产业为导向的田园综合体建设。如成都市郫都区战旗村的“妈妈农庄”经过多年建设发展,现已成为人气旺盛的休闲旅游地和乡村振兴培训基地;驰名全国的“多利农庄”则向世人展现了生态观光农业和经典中式园林有机融合、交相辉映的川西田园风貌;美丽美美的“香溪谷”、新津永不落幕的“农博园”等大型项目都是依托农村产权交易,推动传统农业向创意农业、休闲旅游等现代特色农业转型的具体体现。

(二)有力促进农民群众增收

将农村的“死”资源变成“活”资本,让农民群众畅通处置自身拥有的资源和资产,分享改革发展和城市化过程的收益,是农村产权交易的根本意义。借助农村产权交易平台的信息发布、辐射范围和专业手段等优势,将大幅提升农村产权的交易价格,促进农民集体和农户增收。如2015年,广元市剑阁县公店乡一宗全省首例集体林权竞价交易由成都农交所组织开展,9家意向竞买人报名参与,经过50多轮竞价,从最初每亩120元的起始价竞价至每亩455元,溢价率达280%;2018年,都江堰市聚源镇一宗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在成都农交所公开竞拍,经过积极宣传推广,包括两位海外华人企业家在内的7家意向竞买人报名参与,每亩25.8万元的起始价经过100多轮竞价,最终以每亩124.5万元成交,溢价率高达371%,为农民集体和农户一次性增加财产性收入1600多万元。在财产性收入增加的同时,农民将农地流转后进城或在当地产业项目务工就业,将增加更多收入。

(三)加快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通过农村产权交易,优化了城乡土地资源配置,显化了农村土地资产价值,实现的级差地租返还到农村,以生活方式转变带动促进农业生产发展方式转变,有效解决了新农村建设“钱从哪里来”的问题。如成都十年来,通过成都农交按照“1+N”模式配套了劳动保障站、卫生服务站、人口计生服务室、社会所进行建设用地指标交易和土地综合整治项目招商,撬动社会资金建成了一大批农村新型社区和聚居点。这些农村新型社区都配套了水、电、视、讯、道路、绿化等基础设施,并综合文化活动室、警务室、全民健身设施(场地)、农贸市场、垃圾转运站、公厕、污水处理设施及幼儿园等不低于13个公共服务配套设施,极大地改善了农村人居环境,初步实现了城乡群众生活同质化,为“人往哪里去”和“可持续发展”找到了重要出路。

(四)带动和促进农村金融快速发展

农业类贷款天生存在小额分散、抵押物不足、企业管理不规范和信用评级较差等特点,很行不愿意贷款到农村。为解决农村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多年来,国家和各省都出台了大力促进解决农村融资的办法,一些地方还大胆创新试验,但从根本上仍未有效解决。成都实践表明,农村产权交易是农村金融服务的市场根基,农村产权交易市场的建设发展说定了农村金融服务的广度和深度,交易的规模和顺次决定了农村产权的市场价格和流动性的高低,为银行贷款畅通流向农村奠定了可靠的基础。一是通过农村产权公开市场交易,在不同区域形成了相应的价格,以此作为银行贷款的参考,解决了银行贷款抵押物价值难以确定的问题。二是通过农村产权的规模化流转交易,诞生了大量农业产业项目,其建设发展需要源源不断的资金支持,为银行等金融机构开辟了农村金融发展蓝海。三是在银行等金融机构在农村金融中形成的不良资产,可以通过农村产权交易平台实现快速处置和变现,为银行等金融机构解决了后顾之忧。

(五)加快农村民主化进程

在推动农村产权制度改革过程中,要充分尊重农民意愿,不搞强迫命令、不搞强制交易。发挥农民主体作用,建立农民广泛参与的民主管理机制,实行村民“民主议事”,把农村产权交易过程中涉及农民切身利益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交给群众讨论,“民事民议,民权民定”。各类农村产权通过阳光交易,彻底改变了过去农村“桌面下交易”的原始状态,杜绝了私下流转造成的低价贱卖,有效维护了农民集体和农户的合法权益。从另一个角度看,也堵住了信息不公开、不对等的漏洞,规避了经办人员的廉洁风险,保护了基层干部。更为重要的是,通过“村民自治”以民主方式培养农民自主解决问题的能力,调动了基层群众参与民主决策和民主管理的积极性,有效推动了农村的改革发展,推动了基层民主政治的发展和基层治理机制的完善,将得到广大农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坚定支持。

(秦仕魁系成都农村产权交易所董事长,唐鹏程系成都农村产权交易所副总经理)

创刊词

■ 本刊编辑部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是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之年,也是乡村振兴战略全面实施、扎实推进之年。在这个重要的历史时刻,《三农专刊》诞生了!她的问世,顺应了新时代新要求,使“三农”新闻宣传工作有了新阵地、企业家交流有了新平台,同时为本报增添了一抹新的亮色。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农业强不强、农村美不美、农民富不富,决定着亿万农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决定着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成色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质量。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坚持把“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不断推进“三农”工作的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推动农业农村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产生了历史性变化。

四川是农业大省,有着丰富的农业自然资源,具有做好“三农”工作的良好条件。习总书记在川视察时,要求四川必须扎实做好“三农”工作,加快发展现代农业。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四川代表团审议时,总书记再次强调,四川农业大省这块金字招牌不能丢,要带头做好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篇大文章,推进由农业大省向农业强省跨越。

习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全党做好“三农”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如今,从“天府之国”到全国各地,各级党委政府和广大“三农”工作者,正在以饱满的热情、坚定的决心、有力的举措,积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扎实推动新时代“三农”工作,奋力书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三农”新篇章。

作为新闻媒体,有责任为“三农”工作鼓与呼,有责任为推动“三农”工作的发展营造良好舆论氛围。中国农民企业家联谊会,是农民企业家的精神家园,是汇聚企业界力量服务“三农”的桥梁和纽带,与本报联手创办《三农专刊》,不仅是本报的幸事,更是新闻界和农企界的一件盛事。相信我们的合作,将会迸发出灿烂的火焰;相信《“三农”专刊》,将以靓丽的面容赢得读者青睐。

本刊的办刊宗旨是:“立足四川,面向全国;聚焦‘三农’,关注民企;把握导向,服务大局;贴近基层,反映民声;成风化人,凝心聚力。”我们将牢牢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坚持以正面宣传为主,及时阐释党中央关于“三农”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真实反映“三农”工作的新动态、新经验、新成绩,热情讴歌“三农”战线的新人新事新风貌,大力宣扬企业家和各类企业支持参与“三农”工作的新作为、新成就,努力奉献有思想、有温度、有品质的新闻作品。我们还将根据新时代新闻传播的特点规律,在办好专刊的同时,办好新媒体平台,创新新闻传播形式,不断提高新闻舆论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

欢迎广大企业家、企业员工、“三农”战线的干部职工以及广大读者朋友关注本刊、支持本刊。你们的关心支持,是我们办好专刊的不竭动力。

保护好发挥好乡村功能 建设城镇乡村命运共同体

■ 陈锡文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这要求我们共同思考以下几个重大问题:城镇化的进程是否可以自然而然地解决“三农”问题?如何看待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乡村衰落现象?全面振兴后的乡村应当是一种什么状态?显然,解开这些问题就要求我们更加科学、准确地回答关于乡村振兴的实质或者说内涵到底是什么,这就需要在更深的层次上作更深入的思考。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现代化进程中,城镇和乡村是紧密联系的命运共同体,城镇和乡村对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具有不同的功能,如果哪部分的功能受到了抑制,国家的现代化之路就都不可能持续、健康地迈进。当今时代,若不能形成城镇和乡村的协调发展,那么这个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就是残缺的或是病态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农村和城镇互为依存,它们各自的发展对于对方的发展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乡村必须发挥好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供给的功能

粮食安全,首先是数量安全。从总量上讲,我国目前的粮食产量能够基本满足国人的吃饱需求,但应当看到我国粮食生产中潜在着的一系列矛盾和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有近14亿人口的大国,手中有粮,心中不慌,任何时候都是真理。现在是不是已经可以做到了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呢?当前,我国粮、棉、油、糖、肉、奶等人民生活必需品没有一样不需要进口,而且进口的粮食都还在逐步扩大,这当然不能一概而论地说是好事还是坏事。我国人口多、耕地少,实现农产品完全自给,既难以做到、也没有必要,因为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可以应当合理利用国际资源和国际市场。但也要看到,我国作为人口大国,如果在某些农产品上对国际市场的依赖度太高,就容易面临很大的经济和政治风险。因此,我们需要认真研判:自身有限的耕地资源必须确保哪些农产品的供给,而哪些农产品则可以通过国际市场来满足我们的国内需求。

前几年,国内生产的玉米供给明显超过了需求,库存持续增高,最高时,甚至相当于近一年的产量。但中国之大,需求变化之快,很多情况瞬息万变。去年一年,仅东北政策性收储的玉米库存就即降了10013万吨,这差不多相当于半年的产量。也就是说,2018年的国内玉米需求能够得到满足,实际上是提供了近一年半的产量才做到的。今年的日子怎么过?若今年的玉米产量不增、需求不减,相对于去年,就会有约2000万吨的供求缺口。所以不能轻言我国的谷物供给已经过关。

我国对进口大豆的依赖度越来越高。2017年,我国大豆产量为1500万吨左右,但大豆进口量达到了9553万吨,即85%以上的大豆需求依赖于国际市场的供给。去年3月份以来,由于中美贸易摩擦,我国对原产于美国的大豆加征了关税,来自美国的大豆价格将明显高于其他国家,于是国内企业就不选择进口美国大豆。如何补齐我国国内市场的供求缺口,显然还需要另想办法。我国是大豆原产地,上世纪时,无论是大豆产量还是进口量我国都是世界第一,现在产量我们只能排世界第四,进口量成了世界第一,进口了差不多占世界大豆贸易量的2/3。所以中央提出农业要抓紧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在哪里?不能满足需求的品种产量上不来,而快过了求的品种却还在增产,这就是改革要解决的首要问题。粮食品量要重视,但从现阶段的实际情况看,更要研究粮食的品种结构问题。

乡村必须要持续地发挥好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供给的功能,这是由我国作为人口大国的国情所决定的。但发展农业尤其是粮食生产,与乡村振兴是什么关系呢?无论是乡村振兴的总目标还是习近平总书记讲的五大振兴,产业振兴都放在第一位。乡村振兴过程中当然要引入和发展各种产业,以增“大农民就业、促进农民增收。但是有一条,不论引进什么产业,都不能影响到乡村发挥保障粮食安全和提供重要农产品的功能。这就涉及到严格保护耕地,着力提高粮食和其他重要农产品的产能问题,而这对于在乡村振兴中实现产业兴旺,当然也就形成了一定的约束。那就是发展乡村产业,一定不能突破保护耕地的红线。我国大概有20.4亿亩土地,其中有效灌溉面积为10亿亩多一点。据水利部调查,这10亿亩有效灌溉面积的亩产量,比没有灌排系统的耕地要高出一倍。我国耕地中的有效灌溉面积只占耕地总面积的50%左右,但却提供了我国70%以上的粮食。可现实中面对的问题是,这些好地恰恰也是城镇发展所希望占用的对象,因为它邻近城镇,交通、水源都便利。在实施乡村振兴过程中,一定要清醒认识到,乡村该振兴的产业首先是农业,必须坚决杜绝以产业振兴为名大量占有耕地的现象。而要让乡村更好地发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供给的功能,就必须始终坚持确保耕地的数量不减少、质量有提高。

二、农村必须发挥好提供生态屏障、生态环境、生态产品的功能

改革开放40年来,农村在生态环境方面发生了复杂而深刻的变化,绿观各地,既有荒漠变成良田、林海的,也有青山绿水变成荒山秃岭、污水横流的,这些变化,有的使人振奋,有的让人触目惊心。这就要总结我们过去的经验教训,下决心转到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的路上来。习近平总书记讲,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110年前的1909年,时任美国农业部土壤局局长、威斯康新大学教授的富兰克林.H.金携妻子考察了中国、日本和朝鲜半岛的农业,回去后写了一本名为《四千年农夫》的书,在西方社会引起强烈反响。书中这样评价中国农民:“中国人像是整个生态平衡圈的一环。这个循环就是人和‘土’的循环。人从土里出生,食物取之于土,粪物还之于土,一生结束,又回到土地。一代又一代,周而复始。靠着这个自然循环,人类在这块土地上生活了五千年,人成为这个循环的一部分。他们的农业不是和土地对立的农业,而是和谐的农业。”离富兰克林夫妇访问东亚三国的农业仅仅只过去了110年,但人类社会以及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已经发生了太多、太大和太深刻的变化。回到建立在仅仅依靠人力、畜力和自然力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社会显然是不可能的,但是,反思人类社会在这一百多年间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变化所带给自然界的影响则是必要的,因此,重新挖掘“天人合一”观念的深刻内涵,在新的物质基础上构造一种崭新的精神文明也是必须的。

乡镇企业的崛起是打破我国乡村自然经济的决定性力量。上世纪八、十年代乡镇企业的快速发展,使农民扩大了就业空间,拓宽了增收门路。恒这种“村冒烟、户户点火”的做法,也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到了现在这个阶段,我们就必须还上这笔欠账,面临着如何恢复绿水青山,提供更好的生态屏障、生态环境和生态产品的任务。这个任务非常艰巨,第一,在前三十多年的发展进程中,快速工业化造成的环境污染,有些是城镇工业带来的,有些则是乡镇企业造成的,其中不少被工业污染的环境到目前还没有得到根本治理。第二,农民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已经彻底改变。农民原来的生活消费品,几乎都是从耕地里生产出来或在自然界中采集的,绝大多数是有机物,能消费的都消费了,消费不了的都回归自然了,所以产生不了多少垃圾。但现在农村的生活垃圾跟城市的生活垃圾已经趋同化,因为农村相当部分的消费品也是通过市场买来的工业制成品,很难自然降解。这是是历史进步的必然,但它确实带来了农村环境的污染问题。第三,为了提高农产品产量而使用的化肥、农药等造成了日趋严重的面源污染,土壤、水体、大气都深受其害,有的甚至还影响到了农产品的质量安全。在我们把解决吃饱饭的问题放在首位时,农产品产量增长的重要性必然就居于首位,因而不得不增加化肥和农药的使用量。但过量使用化肥、农药会污染环境甚至农产品本身。现在大家都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正在不断地加以改进,到2018年底,我国化肥施用量已经连续两年负增长,农药施用量已经连续三年负增长。但要彻底解决问题,还需要加强面源污染问题,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所以在乡村振兴的过程中,不能只顾着繁荣、就业、收入,而要把正在恢复的乡村生态和环境,作为一个重要的目标去努力建设。同样的道理,把修复生态、保护环境放在乡村振兴的重要位置,也必然会对乡村的经济发展构成一定的制约。尤其是在乡村产业的选择上,就决不能拣到篮子里的都是菜,那些破坏生态、污染环境的产业,企业就决不能让它扩散到乡村来。而农业的生产方式、农民的生活方式当然也需要朝着环境友好的方向不断进行调整。

三、乡村必须发挥好传承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功能

很多人一想到农村,就会想到乡风民俗浓郁的社火、社戏,现在到乡下去旅游,在景点也会看到各种各样扮演的仪式,如节庆、祭祀、婚嫁等等。但这些东西都是“舞像”,即其体的形象的东西,而真正要了解的,是“具像”背后的文化层面的东西。我国乡村的传统文化,有着丰富的内涵,深入发掘,可以看到其中至少有三大因素,即理念、知识、制度。我们要去挖掘这些深层次的东西,以弘扬传统文化的精华。

农村文化传承是人类社会的又、科学知识。习近平总书记讲:“乡村文化是中华民族文明史的主体,村庄是这种文明的载体,耕读文明是我们的软实力。”能够长久传承、最终成为社会常识的知识,都是人类在生产和生活实践中积累起来的对事物规律性的科学认识。比如,一年可以被划分为二十四个节气,这在我国四次时期就已经载入了书籍。在我国历史上,从皇家到各级地方官吏,都有一个重要的职责:劝农,就是教老百姓怎么从事农事活动。北京颐和园里有个景区叫“耕织图”,园内有十块石刻图像,每一块图像表现一种农事活动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如种植水稻、从育秧、插秧、耘田、秋收,最后打场、藏粮;再如养蚕、从孵化、采桑、缫丝,到丝织,每个生产环节都通过一幅生动形象的图像来体现,通俗易懂。这就是科学知识通过文化在进行历史传承,如果没有这种传承,我国的农耕文明就不可能达到如此高的水平。

传统文化中还有一大要素就是制度。直到今天,传统文化里仍有很多制度性的东西是值得我们借鉴的。美国在上世纪20年代应对经济危机时实行的“无追索权贷款”农业政策,就是从中国古代的常平仓制度中得到的启发。当时的美国农业部长华莱士在他的日记中写道,他之所以能够提出这一政策设想,是受到中国留学生陈焕章在其博士论文《孔子及其学派的经济原理》中关于中国常平仓制度的启发。我国在战国时期就已经形成了政府调控粮食市场的机制,李悝在当时就创立了“平籴法”。到汉代,桑弘羊又建立了“均输法”,归结起来就是“粜、粜”二字,它是现代政府对粮食市场实行吞吐调节制度的前身。“粜”是买入;“粜”是卖出。为了避免谷贱伤农,在市场粮价过低时,政府就往储备库里“籴”入粮食,这就减少了流通量,市场粮价就会上涨;而当供给短缺、市场粮价上涨过多时,政府就将库中储备粮“粜”出,以增加流通量,使市场粮价下跌。因此,政府储备的粮食,总是在粮价低时籴入、粮价高时粜出,这就形成了政府调节粮食市场供求和价格的有效机制。

再比如,2018年12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修正案,2019年1月1日开始施行。这次农村土地承包法的修改,最重要的是落实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农户承包权、土地经营权“三权分置”的制度创新。在土地承包法的修改过程中,围绕第46、47条的内容人们是有争议的。争议的焦点,一是关于“流转”的内涵到底是什么?我国历史上,土地的买卖就是买卖,租赁就是租赁,典地就是典地,每一种行为的含义都是确切的,不会产生歧义。但“流转”到底指的是什么?这就要从这个词说起“流转”这个概念?二是关于“经‘流转’取得的土地经营权”是属于什么性质的权利?它应当或可以享有什么样的权利?

关于第一个问题,修改后的农村土地承包法第36条规定:“承包方可以自主决定依法采取出租(转包)、入股或者其他方式向他人流转土地经营权,并向发包方备案”。在这里,“流转”仍然是一个集合性的概念,它包括着多种行为,但这个规定至少是明确了“流转”中有一种行为是“出租”。但出租为什么不叫出租而要叫“流转”呢?这就要回到顾改革后农村集体土地实行家庭承包经营的政策演变过程。改革初期,人们对于集体的土地能否实行家庭承包经营尚有很大争议,如果允许农民土地的农户自己不种、而用于出租取地租,那就更难以让人们接受。因此,在1982、1984年这两个指导农村改革的中央“一号文件”中,就都曾明确规定“承包的土地不准出租”。但随着改革的深入,农村分工分业和劳动力转移就业的不断拓展,农户承包土地的经营权如果不准出租,那就可能会荒废。为了突破这一窘境,农民就发明了“流转”这个概念:既然政策不准“出租”,那就叫“流转”。于是“流转”的概念就流传至今。虽然后来人们对土地经营权的“流转”又赋予了其他含义,如土地经营权的股份合作等,但说到底,承包土地经营权的“流转”,本质就是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对土地经营权的让渡,其主要形式是土地经营权的出租。

租来的农村承包土地经营权享有什么样的权能?学界认为这取决于它的性质到底是属于债权还是物权。其实,即便解决了租来的土地经营权的权利属性问题,也还存在是否属于物权的土地经营权就都可以再次出租或用于融资担保,而属于债权的土地经营权就都不可以再次出租或用于融资担保的问题。因此,作为学术问题,学论显然还会继续。但在我国历史上的乡村习惯法中,这个问题其实早就已经得到解决。我国耕地租赁的历史非常悠久,特别是南宋以后,大量北方移民迁徙到江南,更是进一步促进了农地租佃制度的发展。我国农地租佃的习惯法中,一个重要的制度设计,就是赋予了以不同形式租佃的土地可以享有各不相同的权利。我国历史上关于农地租佃的习惯法所给予我们的启示是,租来的土地经营权应当或可以享有何种权利,关键要看承租者的取得方式或说是付出了何种代价。城镇建设用地的使用权可以依法转让或用作融资担保,是因为建设用地的使用权人一次性地付清了40年(商贸用地)、50年(工业用地)或是70年(住宅用地)的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因此城镇建设用地的使用权证本身就具有很高的含金量。但农地经营权的租赁,无论签订的租地合同是多少年,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土地经营权的承租者都是按年交租金。先交租再种地的叫“上打租”;先种地等秋后再交租的叫“下打租”。如果签了20年的租地合同,但只交了一年(上打租)甚至连一年的租金都还没交(下打租),就拿着土地经营权的租赁合同到金融机构来做融资担保,那么他到底是以什么来做的担保呢?因此,新修订的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土地经营权的承租人如要将土地经营权再次出租或用作融资担保,必须经土地承包经营权人的书面同意并向发包方备案。这就赋予了出租土地经营权的承包农户必要的知情权,使得他可以依据土地经营权的具体租赁方式来确定同意与否,以避免由此可能给承包农户带来的风险。而金融机构在接受土地经营权的融资担保时,充分了解土地经营权的承租人到底是如何取得的经营权,为此付出了多大的代价等,显然也是必不可免的。

传承和弘扬我国的优秀文化,要从更深层次的理念、知识和制度去作思考,而不能仅仅满足于对表象的模仿。显然,推动乡村振兴的根本目的,是要维护好国家、民族永续发展的根脉。对于中华民族而言,确保国家粮食、生态、文化的持久安全,就是维护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根基。因此,乡村振兴的任何措施,都必须有利于维护国家的粮食、生态和文化安全,而不是相反。城镇化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但每个国家的城镇化道路都有其自身的独特之处,甚至连人口城镇化率的统计口径也各不相同。但从我国当前所处的发展阶段看,我国常住人口的城镇化率必将还会进一步提高,这就意味着乡村人口在现有基础上还会继续减少,而乡村现有的300多万个居民点中,也还会有相当部分将逐步灭失。但这些都不是衡量乡村是否振兴的重要指标,衡量乡村是否振兴的重要指标,是乡村所特有的、也是必须发挥好的功能是否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作者系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农业与农村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共十七大代表,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热烈祝贺

“三农”专家寄语

“三农”问题是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的一大基本问题。也是长期以来全国重中之重。农业基础仍然薄弱,农村发展滞后,农民增收仍然困难,依然是当前相当长时间面临的实际问题。

企业家日报是对中国经济生活有重大影响力和影响力的新闻媒体,与中国农民企业家联谊会联合创办的《三农专刊》在中国媒体中鸿篇首例。它的创刊为“三农”提供了一个学术研讨的平台、信息交流的窗口。

原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同志,曾以思想的力量、人格的魅力,影响了中国农村改革的进程,被誉为“中国改革之父”。他毕生研究中国的“三农”,给我们今后的研究,探讨留下了无尽的

希望《三农专刊》在今后的办刊中,“三农”,开辟新思路,寻找新办法,创出

希望更多的专家、学者,关注“三农”,研究“三农”问题。

祝《三农专刊》越办越好,越办越

——山西省原副省长、省政协原主席

《企业家日报》是办得很好的一

它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企业成绩和发展经验,传播以创新为核心精神。根据新的形势,为了进一步加强务“三农”工作的宣传报道,与中国农家联谊会联手创办《三农专刊》,今为广大读者见面了!这是媒体界、企业农”战线的一件喜事,值得庆贺!希望握方向,抓住重点,加强实施乡村振宣传报道,及时反映农业产业、农业村文化、农业生态和农村组织建设得的成绩,讲好“三农”战线的故事,日新月异的新农村面貌。

——中国扶贫基金会会长段应碧

《企业家日报》是面向全国企业企业尤其是民企的重要媒体。中国家联谊会能与之联盟创办《三农专

闻界和农企界的一件盛事,可喜可创办,使“三农”工作新闻宣传有了专同时为传播农企文化、介绍企业风采展经验,开辟了新平台。希望《三农专初心,牢记使命,充分发挥舆论引导助力“三农”工作创新发展做出贡献。专刊》越办越好、越办越红火!

——原江苏省委农工部部长吴锆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农”工作的总抓手。在实施乡村振兴战全面小康的历史性时刻,《三农专了,在此表示热烈祝贺